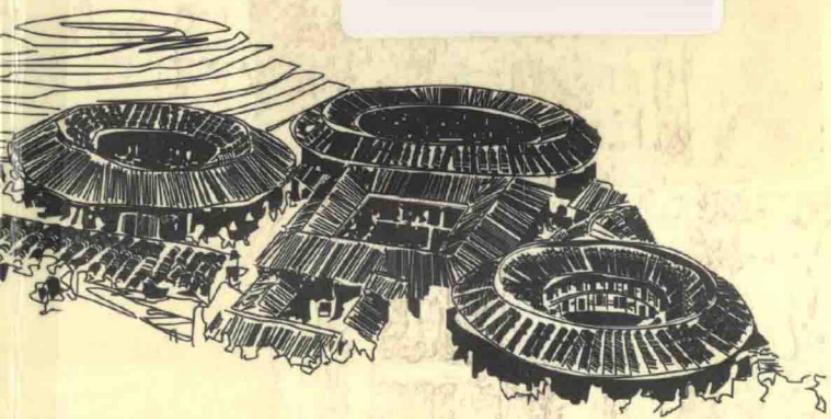




印尼客家

方言与文化

李小华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印尼客家方言与文化

李小华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尼客家方言与文化/李小华著.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23-4174-1

I. ①印… II. ①李… III. ①客家话-方言研究-印度尼西亚 IV. ①H1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0091 号

印尼客家方言与文化

Yinni Kejia Fangyan Yu Wenhua

李小华 著

出版人: 韩中伟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责任编辑: 吴兆强

印刷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30 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和调研工作难度较大，海外汉语方言和文化研究一直比较欠缺，直至近年才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但也多集中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调研。至于印度尼西亚的汉语方言和文化，迄今为止，在内地仅见一些零散的报道，欠缺系统的研究。

关于印尼客家方言和文化的专门论述也极其少见，尤其是在方言方面，目前所见比较详细的研究是中山大学2010届硕士毕业生陈英纳的学位论文《范德斯达特〈客家词典〉的初步研究》，主要是通过对荷兰汉学家范德斯达特（P.A.Vande Stadt）1912年编纂出版的《客家词典》（Hakka Woordenboek）进行初步的调查，利用表格数据处理软件Excel梳理这部词典所记录的语音和词汇系统；另有几篇相关的论文见报，如李如龙先生的《南洋客家人的语言和文化》和《印尼苏门答腊北部客家话记略》；此外，就是在一些讨论海外华侨华人、海外客家的文章或地方志中提及印尼客家人、印尼客家话的大致分布，如黄昆

章《印尼客人的地位与作用》、广东和福建等地的县志；还有的是在考察印尼某一语言或方言、华语及其教育时略论与客家方言相关的现象，如在探讨印尼语、华语、闽南话、粤方言或其他方言时论及来自客家方言的借词、受客家方言影响的语音、词法或句式，如刘文辉、宗世海《印度尼西亚华语区域词语初探》，温北炎《试析印尼华文教育的几个问题》，王爱平《汉语言使用与华人身份认同——对400余名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

近年台湾出现几篇有关印尼客家的硕士学位论文，如黄惠珍的硕士学位论文《印尼三口洋客家话研究》，文中主要是调查分析现今印尼三口洋地区客家话的语音特征；陈欣慧的硕士学位论文《印尼亚齐客家人之研究》，调查印尼亚齐的华族状况，主要研究以客家人为主的华族及其与亚齐族等当地民族的互动关系。

在海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少，仅有个别学者的论著，如上文所提及的范德斯达特（P.A.Vande Stadt）的《客家词典》，印尼华人学者哈玛宛的论文集《印度尼西亚西爪哇客家话》及其附录中的《正客音译义木由来话》，印尼学者迪德·吴托摩的论文《印尼华人的多元语言和种族性征》等。

由此可见，海外客家方言和文化的研究是较为薄弱

的，尤其是印尼客家方言，由于调研困难，所见的论著更加有限。

本书目的是对当今的印尼客家方言和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调查，所以，尽量收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亲自赴印尼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印尼客家话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特征，考察印尼的客家文化，并对前辈同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将实地田野调查的结果和祖籍地的客家方言文化进行比照，以期反映印尼客家方言和文化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差异。

本书的调研、写作历经五年多，主要调查印尼西爪哇的客家人，并以雅加达、万隆的客家人为主。其间通过各种渠道访问了几十位印尼客家人，有时是利用印尼客侨回家探亲时拜访他们，有时是利用客侨聚会时向他们发调查问卷，有时则访问客侨社团广泛了解情况。其中，深入走访并录音的印尼客家人有8个，祖籍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在深入印尼客家文化调研时，我们发现印尼的客家文化主要传承了各自祖籍地客家的特点，基本上广东的客家人传承广东客家文化，主要源自梅州客家人；福建的客家人传承了闽西的客家文化。由于广东籍的客侨较多，而且所说的客家话与祖籍地的客家话相比表现出一定的差异，而福建籍的印尼客家人数相对较少，且语音基本与祖

籍地无异。所以，本文的语音、词汇发音人选自两位祖籍梅州的印尼客家华侨李瑞泉先生和李源基先生。

主要发音人和访问者情况如下：

(1) 李瑞泉，男，祖籍广东梅州蕉岭，1948 年出生于印尼，现居雅加达，1968 年加入了印尼国籍，中学学历，会说流利的客家话和印尼话；其家中有三代人，妻子也是客家人，会说一些客家话，两个儿子都曾送往上海学习汉语；李先生平时家中和父母交谈时多说客家话，与妻子、孩子交流则大部分用印尼话。

(2) 李源基，男，祖籍广东梅州梅县，1949 年出生于印尼，现居雅加达，上过初中，会说流利的客家话、广东话和印尼话；其妻子是广东番禺人，也出生于印尼，会说广东话和普通话；两个孩子都曾送往广州学习汉语，现有一子长居中国，在中国结婚、工作；家庭交际语主要是广东话、普通话和印尼话，同乡或朋友之间才用客家话交流。

(3) 卢泰福，男，1931 年出生于福建永定，于 1951 年移居印尼，现居雅加达，属第一代印尼客家移民，只读过几年书，会说客家话、印尼话和普通话，未加入印尼国籍；其妻也是客家移民，家中夫妻主要用客家话交流，子女会听客家话，会说一点客家话，平时家庭用语是客家话

和印尼话混杂。

(4)徐耀中，男，退休中学教师，祖籍广东蕉岭，1939年出生于印尼，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平时在印尼雅加达永定会馆给华侨子女补习中文，本人会说普通话、客家话、印尼话和邦加话；其妻也出生于印尼，祖籍广东大埔，子女会说客家话，家庭交际语主要是客家话、印尼话和邦加话。

(5)游来河，男，1931年出生于福建永定，1948年移居印尼，现住万隆，基本上没有上过学，会说客家话、印尼话和普通话，也属第一代印尼客家移民；其妻是广东梅州人，会说梅州客家话；子女基本上印尼化，不会听、说客家话，他们用英语和印尼话，而家庭交际语主要是印尼话。

在印尼调研期间，受到当地客家华侨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被海外客侨的中国情谊深深地感动。当得知我是因承担广东省的一个研究项目而来印尼调研客家方言与文化时，他们不是仅仅把它看成是一个单独的研究项目，而是认为我代表中国来调研印尼客家文化，甚至认为是体现了祖国对他们的关怀，表明故乡没有忘记海外游子，当中让我深深震撼的是徐耀中先生。他不只一遍地对我说：“现在中国强大了，我们在国外的华侨



印尼客家方言与文化

为之骄傲，也感到扬眉吐气。”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海外华侨华人是我们同根的亲人，华侨的爱国热情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支撑，当今中国崛起面临众多的困难与阻力，我们应充分珍惜至今仍存的华侨中华情，大力发展对外国际传播，加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目 录

第一章 客家方言与文化的形成和流播	1
第一节 客家方言的历史形成	1
第二节 客家方言的构成与层次	13
第三节 客家人在海外的分布	34
第四节 客家方言和文化在海外的传承	39
第二章 印度尼西亚的客家	46
第一节 印度尼西亚人文地理简介	46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的客家人	50
第三节 印度尼西亚的客家方言概略	56
第三章 印尼客家方言语音分析	60
第一节 当今印尼客家方言语音	60
第二节 一百年前印尼客家方言语音	132
第三节 当今印尼客家语音与梅县客家语音的共时比较	137
第四章 印尼客家方言词汇特点	139
第一节 印尼客家方言对祖籍地方言词汇的传承	139
第二节 印尼客家方言词汇的变化	146
第三节 印尼客家方言词汇与其他语言、方言的接触与融合	147



第五章 印尼客家方言语法特点	283
第一节 结 构	283
第二节 否 定	295
第三节 比 较	299
第四节 处 置	301
第五节 被 动	309
第六节 体 貌	310
第六章 印尼客家的婚丧嫁娶习俗	321
第一节 印尼客家人的婚嫁礼俗	322
第二节 印尼客家的生育文化	337
第三节 印尼客家的丧葬仪式	343
第七章 印尼客家的饮食庆典文化	352
第一节 客家饮食文化	352
第二节 印尼客家人的饮食习惯	358
第三节 印尼客家的节事活动	361
第四节 印尼客家社团与文艺活动	370
第八章 印尼客家文化与客家精神	375
第一节 客家方言中的文化折射	375
第二节 印尼客家的寻根意识和客家精神	378
后记	381



第一章

客家方言与文化的形成和流播

第一节 客家方言的历史形成

语言是民族识别的基本要素之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语言，就如我国，除汉族外，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这 55 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满族已完全转用汉语，其他 53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还使用着不同的语言，而同一语言内部，又由于居住地域的区别，分别说着不同的方言。

何为民族？民族就是以共同的语言、地域和经济生活为纽带，有着共同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和文化观念的共同体。同一民族共同体内又衍生出不同的支脉，罗香林称之为“民系”。客家民系就是“汉民族共同体内部的一支，经过长期的迁移，最后到达并定居于闽、粤、赣交界地区，并形成有别于周边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习俗和其他文化事象的群体”。^①

客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客家方言也经由了一个由孕育到成熟的漫长阶段。

关于客家的来源，客家民系的形成，罗香林先生早于 20 世纪

^① 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9 页。



30年代就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考证，其后的学者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或给予更细致的辩证，但主流的观点仍然未变：客家人的祖先在中原，客家是从两晋南北朝起为避战乱、灾荒等，历经磨难，辗转迁移至南方定居而生成的民系。

客家的迁徙历史虽然久远，但真正形成一个民系却是在唐末至宋初，如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①中所言：

从客家住地各方志所载其地户口宋时主客分列一史实观察，亦可推知客家先民的迁移运动在五代或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象，“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时。是时，客家居地虽说尚杂有无数的主户，然而新种一入，旧种日衰，主户的语言日为客语所排驱，主户的苗裔亦渐渐为客家所同化，而失去其特殊的属性。观此种种，可知客家的成形年代，确在赵宋初年。

通常，我们界定一个个体或族群是否属于客家，主要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①是否具有客家人的血统；②是否会说客家话；③是否具有客家人的心理认同。其中，会不会说客家话被视为最重要的因素。在汉族的各个支系中，客家人是最为看重自己方言母语的族群，常言道：“唔识客家话，唔算客家人”。

也正因此，大多数学者把客家方言作为客家民系确立的重要标志，罗香林对客家民系形成时间的界定即是以客家方言的形成作为依据；谢重光也认为，判断客家民系是否形成，应以构成民系的四要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社会心理素质、共同的语言——客家方言是否已经形成作为标准^②；陈支平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8-19页。

② 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甚至提出“客家方言才是界定客家的最基本要素”^①；邓晓华在《论客家方言的断代及相关音韵特征》一文中则强调“历史的、文化的证据很难科学地给客家断代，真正能给客家断代问题提供站得住脚的证据的是语言学材料”。^②

王东在相应的著述中也非常鲜明地突出了客家方言的标记性作用，指出客家人之所以区别于非客家人，其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人的标志，也是客家民系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可以说，一个客家人把另一个客家人认同为自己的属群，最直接、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因为他或她与自己同讲一样的客家话，而不是共同的地域、血缘或其他什么原因；所以，以客家方言形成与否来认定客家民系形成与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③对此，我们深表赞同，因为它确实符合了客家的史实。

虽然，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文化、共同的心理特质都是构成一个民系的重要因素，是判断一个民系生成的重要标志，比如，在南方的五大民系中，越海系、湘赣系、广府系、闽海系就因地域而得名，因为人们生活在同一蓝天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共饮同一条江水，日积月累，培育出相似的文化心理，说着同样的方言土语，如俗语所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客家民系却不同，或许因其迁徙的历史久长，或许因其分布的地域广阔，不宜以地域命名，故称为“客家”，即取“客而家焉”之意。从古至今，客家人不停地迁徙，不断地播迁，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地平线上皆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也有人说，“哪里

① 陈支平《客家源流新探》，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 邓晓华《论客家方言的断代及相关音韵特征》，《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③ 王东《客家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印尼客家方言与文化

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哪里有一片土，哪里就有客家人”。

所以，对于客家这一特殊的民系，其形成与否不能简单地以共同的地域来界定，而文化是一个宽泛又模糊的概念，血缘也不易确定，共同的语言——客家方言就成了最为直接简易的测衡标准。

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客家方言是客家民系确立的标准，客家方言与客家民系相伴相生，而多数学者又认同客家民系大致形成于五代宋初之际；那么，客家方言具体形成于何时？是宋前、宋代抑或宋后？

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据罗香林的考证，客家方言的形成与民系同步，当以赵宋为起点，因为此时的华南汉族各支系各自演化，客家方言已渐成系统。

谢重光先生在《客家源流新探》^①一书中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客家先民向南迁徙，离开了中原和江淮，进入比较封闭、与中原和江淮隔绝的赣闽粤边山区，时间久了，语言就会与中原、江淮的语言不同，慢慢形成自己的特点；而客家话开始脱离中原和江淮的汉语祖语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时期，就是客家话开始形成的时期；但是，一种语言从脱离祖语开始演变，到正式形成一种与祖语有一定区别的方言，其间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所以，综合了各方研究的结果，他推断客家方言在南宋时形成，并且说：

既然南宋时客家人已经形成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社会心理素质、共同的语言——客家方言，那么，肯定客家民系至迟在南宋时已经正式成立，应是较合宜的。

对于客家方言形成于南宋这一结论，谢重光认为除了有客家

^① 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第 168—178 页。



先民南迁入赣南、闽西的高潮到南宋初才完成这一证据外，另外还有两条补充材料以资佐证，一是南宋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卷三“五民”条：

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居于村落，容貌鄙野，以唇舌杂为音声，殊不可晓，谓之萎语。二曰北人，语言平易而杂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乱，占籍于钦者也。三曰俚人，史称俚獠者是也。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语言尤不可晓。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五曰蜑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语似福广，杂以广东西之音。

二是现代方言区划与历史政区地理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汉语方言区和次方言区的界线，有很大部分跟南宋时期的一级（路）或二级政区（州）的界线相重合；这是因为宋代政区划分已考虑到人文地理的因素，而方言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况且，现代南方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在南宋时已基本形成，后世改变很少。

王东在探讨客家民系的形成时，也对客家方言的形成历史进行了一番考证，首先，他认为罗香林提出的“客家方言形成于北宋时期”这一观点是没有确切材料可以证明的，罗香林在著作中视为重要证据的宋人陈一新的《贍学田碑》一文也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继而，他指出随着移民的推移，当大规模移民运动结束时，客家大本营地区的居民在语言上渐渐与北方方言相分离，一旦客家先民的语言与北方方言相分离，即表明客家方言基本形成；最后，他又参考了王力汉语语音史的分析资料，猜测客家方言与北方方言分离的上限和下限分别是在14世纪和17世纪，推定客家方言的形成时期应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间，也就是相当于明朝



中期。

以上各家对客方言形成时期的不同界定，在时间的维度上可谓跨越了从宋至明好几个世纪。综观这几种意见，我们不能赞同客家方言形成于明朝的说法。移民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拥有一定的人口是民系形成的标志，也是一种语言或方言生成的条件，但不应以哪一次的人口迁移或人数的变化作为最重的砝码；也不宜因为大规模移民运动在什么时候结束，就推断客家方言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形成，如此的推论可能有失偏颇。

或许认识到这样的问题，王东后来也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在《从赣客方言的类似性看客家方言群的源流》^①一文中，他说：

的确，两宋之际的北方移民，对客家方言群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近年来，很多学者都把客家人的形成划定在南宋时期。我本人在有关著述中，也把这一时期的北方移民视为客家方言群的重要源头。不过，如果仔细地分析这次移民对赣闽粤毗邻地区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以往的有关结论，对这次移民浪潮中北方人口所占的比例，往往估计得过高。

在同文中，他又说：

从方言地理的角度来讲，在北宋时期，江西的南部、福建的西南部，甚至还包括粤北的一部分地区，其主要方言应该是早期的赣方言（或其变种）。后来的客家方言，正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上发展起来的。相应地，客家方言群也正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之上生成和发展起来的。

^① 王东《从赣客方言的类似性看客家方言群的源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